



# 失独夫妻起诉要求取回冷冻胚胎

## 法院判决须由合规医疗机构接收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古雪丽 葛思彤

一对痛失独女的夫妻，将希望寄托于他们10年前冷冻的两枚胚胎，而当他们想从医院取回这份“希望”时，却遭到了院方的拒绝。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特殊的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在情感诉求、法律规范与伦理原则之间作出审慎判决。

2014年，苏苏和阿立夫妻在新疆某医院接受了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当年5月，医院为他们培育4枚胚胎并移植了其中的2枚，剩余的2枚胚胎被冷冻保存。

此后10年间，夫妻二人按时交纳胚胎保管费。然而，2024年10月，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们唯一的女儿因病去世。此时，那两枚被冷冻了10年的胚胎，成为他们重新孕育家庭希望的寄托。

今年年初，苏苏夫妻与新疆某医院协商，希望取回冷冻胚胎，转运至外省的一家医院进行植入手术，遭到院方拒绝。今年8月，苏苏夫妻将新疆某医院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医院返还2枚冷冻胚胎。

法庭上，苏苏夫妻表示，冷冻的胚胎源自他们的精子和卵子，承载着二人独特的遗传信息，他们理应拥有处置权，且当年夫妻二人在医院签署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知情同意书》中明确约定，他们有权选择冷冻胚胎的处理方式。

对此，新疆某医院代理人辩称，冷冻胚胎储存、处置受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约束，根据相关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必须在经批准的医疗机构实施。胚胎储存、处置和使用关系到生命伦理、社会公益和医疗安全，法律严禁买卖和私自转移胚胎。苏苏夫妻要求将冷冻胚胎移交至其自行联系的外省某医院，可能会使冷冻胚胎脱离原获批的医疗质量控制体系，存在巨大风险。

此外，双方在2014年签署的知情同意书，是医疗合同的基础。苏苏夫妻要求变更冷冻胚胎保管和使用地点，构成了对原合同约定的实质性变更，在未达到成的一致且确保符合所有法律规定前，医院按原

约定继续保管冷冻胚胎合法合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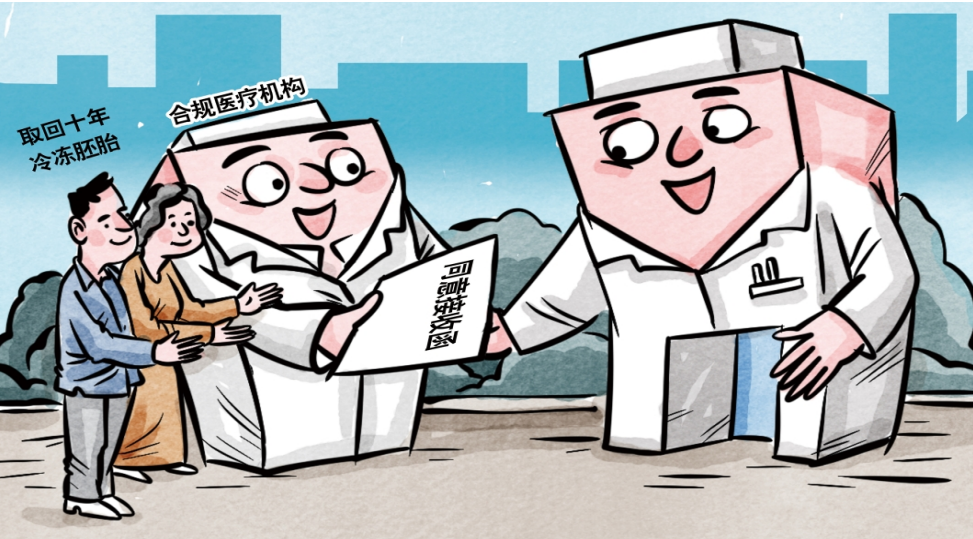
审理中，法院首先确认了双方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并明确指出，涉案冷冻胚胎含有苏苏夫妻的遗传信息，在生命伦理上与其有最密切的联系。根据知情同意书约定，夫妇二人对冷冻胚胎享有处置权，有权选择冷冻胚胎保存的医疗机构并接受治疗。

但法院并未支持苏苏夫妻“直接占有”冷冻胚胎的诉求，而是设定了通过具有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移交的关键条件。

今年11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要求新疆某医院在苏苏夫妻提供一家经国家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具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资质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同意接收函的10日内，将2枚冷冻胚胎交付给该指定医疗机构，驳回了苏苏夫妻要求直接占有冷冻胚胎的诉讼请求。

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漫画/高岳



## 在医疗监管框架下依法平衡各方权益

规范》的规定。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对医疗机构设置条件、临床医师、技术人员、护士的资质，医疗场所及设备的配备及要求，技术规范等均作出严格的监管规定。

上述规定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进行了严格限定，而关于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虽然我国法律尚未明确，但应赋予特殊尊重和保护。

一方面，冷冻胚胎携带双方提供者的遗传信息，取自人体含有遗传功能单位并具有实际或者潜在价值的材料，属于遗传资源，具有发展成为人类生命的潜在可能，蕴含人类尊严和伦理价值，应属于具有高度人身属性和人格利益的“伦理物”，除含有人身属性外，还涉及生命伦理及公序良俗；如若脱离监管，允许个人直接持有和转运，将面临代孕、买卖、基因

编辑、保管不当损毁、遗传资源非法利用等一系列无法控制的法律与伦理风险。

另一方面，冷冻胚胎在保管及植入的过程中，均须遵循特定的技术规范，如由个人直接占有支配冷冻胚胎，在胚胎转移、保存或运输过程中则存在因个人保管操作不善导致冷冻胚胎被损毁、灭失的风险，届时可能因权责划分导致新的纠纷。因此，在作出判决时，对返还胚胎的方式设置了附加条件。

此案的判决并非简单否定权利归属，而是为了防范胚胎脱离监管后可能引发的不可控风险，社会公共利益的优先保护，最终是为了实现更广泛、更有序的个人价值和利益。通过有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移交，既是对胚胎生命属性的尊重，又是对原告实现生育愿望最安全、最合法的保障路径。

# 空壳劳务公司“移花接木”转移涉诈资金

## 义乌检察全链条打击犯罪追赃挽损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陈曦 周涵睿

“兄弟，现在在公司账户走账给的手续费可高了，有没有兴趣合作？”

此前，薛某等人利用空壳劳务公司为掩护，以“发放劳务费”之名，行转移涉诈资金之实，短短数日便转移赃款420万元，致使全国多地多名电信诈骗被害人的钱款被迅速“洗白”，给款项追讨工作带来相当难度。

近日，经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薛某及其同伙彭某、万某等人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均被义乌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目前，判决已生效。

### 真老板公司 费尽心机转移涉诈资金

2024年5月，在四川成都经营劳务公司的薛某，在一次偶然机会中，结识了某项目负责人郑某（另案处理），二人逐渐建立起合作关系。在一次酒局上，郑某提议“合作”：利用薛某公司的对公账户，以虚假发放劳务费的名义帮助他人“取现”，并承诺支付3%的手续费。

“您公司业务量大，账户额度高，操作起来方便。如果合作顺利，一天赚几十万元不是问题。”郑某劝道，“万一银行问起，就说是正常劳务派遣费用，以您公司的业务体量，不会引起怀疑。”

在郑某的游说下，薛某动了心，但他深知，这些需要转移的资金极有可能属于非法所得。

最终，薛某与郑某商定了一个“万全之策”：由薛某寻找“挂名法定代表人”，成立一家独立的空壳劳务公司。薛某负责利用其资源对公司进行包装，提升银行账户的转账限额；郑某则负责招揽“业务”。资金到账后，便以支付劳务派遣费的名义取现，如此一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

薛某、郑某无关，即便东窗事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法律风险。方案既定，二人兵分两路开始行动。

### 假老板真要挟 利益分配不均发生内讧

薛某首先找到了公司合伙人孙某（另案处理），许诺分红，请她物色人选。孙某推荐了自己的前夫彭某。

然而，彭某同样清楚担任此类“挂名法定代表人”的法律风险，对资金的非法律性质也心知肚明。为规避风险，他说服朋友万某出面担任法定代表人，并承诺每月向万某支付5000元薪酬。2024年10月，在彭某的指挥下，万某办理了公司工商注册及对公银行账户开设等手续。

与此同时，郑某通过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联系到第一笔“业务”。2024年11月12日，一笔200万元的资金如期转入该空壳公司的对公账户。薛某立即指示彭某取现，披着“劳务公司”外衣的账户未引起银行注意，取现过程十分顺利。彭某因此获得5万元报酬，这让仅拿“固定工资”的万某心生不满。

次日，第二笔220万元的资金到账。但当彭某联系万某配合取现时，万某却突然变脸。凭着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万某以“不去银行办理就无法取现”相要挟，要求提高此次“好处费”金额。他直言：“我的风险最大，拿到的钱却最少，钱的来路大家都清楚，必须加钱。”

薛某、彭某深知这笔资金无法退回，为及时完成取现，只得先妥协，最终商定将万某的报酬定为15万元。“风波”暂时平息，取现得以完成。

### 助追赃促退赃 检察履职保护民生

空壳公司的伪装并未维持太久，2024年11月初，各地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受害者陆续报案。其中，被害人许某向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报案，

称其因投资炒股被骗200万元，其中有40万元流入该空壳公司的对公账户后被取现转移。义乌警方立案后，于当月将薛某、彭某、万某等人抓获。薛某等人精心构筑的空壳公司骗局被完全识破。

鉴于该案涉案金额巨大，被害人分布广泛，义乌市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同时，检察机关对涉案的孙某进行立案监督，督促公安机关及时实施抓捕，确保其到案；对已潜逃至境外的郑某开展劝返工作。最终，该案5名核心成员全部归案。

2025年2月17日，公安机关以薛某等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将案件移送义乌市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审查认定，薛某等人通过空壳公司转移的涉诈资金总计达420万元，且大部分被害人损失难以追回。

承办检察官龚捷介绍，为解决“人到案但钱难追”的困境，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多次向犯罪嫌疑入及其家属阐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积极促成退赃退赔。最终，在判决前，5名涉案人员共同退赔了全部被害人损失，并退缴了个人违法所得。

“多亏了检察官，我们的工资才有着落。”表达感谢的不仅有被害人，还有薛某原劳务公司的员工。原来，薛某的公司仍在正常运营劳务派遣业务，与众多建筑工人、保洁人员相关联。时值年末结算，因公司法定代表人薛某被羁押，账户上用于发放工资的百万余元资金无法动用。在薛某认罪并承诺退赃的前提下，检察机关依法对其变更强制措施，确保员工工资按时发放，保障了员工的合法权益。

“这种空壳公司看似在进行劳务派遣，实则是为了诈骗资金‘洗白’的‘中转站’。这类行为既助长了上游电信诈骗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也严重侵蚀了社会诚信根基，必然受到法律的严厉打击。”龚捷说道。

## 网购家电出现故障要求换新遭驳回 法官提醒

# “只换不修”承诺并非无条件适用

□ 本报记者 丁国锋  
□ 本报通讯员 许可 杨伊凡

网购家电后购买“只换不修”延保服务，家电遭遇性能故障时是否可以直接换新？近日，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为上述问题作出了解答。

2022年11月，小王在某电商平台花费5399元购置某知名品牌扫地机器人后，又通过该平台向某科技公司支付700元购买“3年只换不修”小家电延保服务。

根据服务约定，服务期内产品正常使用，若出现三包范围内机械或电气元件损坏所导致的性能故障（排除自行拆装、人为及意外损坏），可更换一次同款或同价位新机，也可补差价置换更新机型；延保服务委托第三方服务商提供。若双方对故障认定存在

分歧且无法协商一致，以原厂官方检测结果为准。

2025年4月，扫地机器人出现故障，小王遂向科技公司申请延保服务，并自担运费将设备寄送至指定地点维修。某光显公司检测后出具报告，载明“滚刷卡异物导致异响，清理后工作正常，未涉及机械或电子元件故障，不符合换新条件”，品牌方亦出具“检测无异常”的维修清单。

小王表示异议，双方协商未果，小王将科技公司诉至宿豫区法院，要求公司按延保服务内容为其更换同品牌同档次新机型（由其补足市场差价），并承担自己寄回产品的物流费用。

庭审中，小王主张，扫地机器人存在运行异响等故障，属于延保服务覆盖范围，而科技公司仅以“清理后故障解决”敷衍，既未提供有效维修记录及视频影像资料，亦未按承诺履行更换义务，已构成违约，科技公司则辩称，涉案商品未发生约定的

性能故障，不符合换新条件。

法院查明，小王已提供证据证明扫地机器人存在性能故障，完成其举证责任。科技公司提交的检测报告、品牌方维修清单等证据，能够证明故障系异物堵塞导致，未涉及约定的机械或电气元件损坏。小王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提出异议，并要求科技公司提供异物、维修视频等佐证，但未提交任何反证支持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法院判决驳回了小王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延保服务时应审慎阅读延保条款，应知晓“只换不修”承诺并非无条件适用，通常仅限于商家承诺的特定范围内的故障原因。若商家举证证明性能故障原因不符合换新条件后，消费者不认可商家证据效力的，应就性能故障符合换新条件承担进一步举证责任。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通讯员 辛明厚 王一洲

在房产交易中，买方通过中介公司购房，却遭遇房地产经纪人精心设计的骗局，损失数百万元房款。尽管房地产经纪人已被绳之以法，但经济损失却因罪犯无力赔偿而难以追回。此时，中介公司是否应为员工的职务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责任又该如何划分？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对此类民刑交叉案件的责任认定给出了明确答案。法院认为，房地产经纪人在职权范围内的行为属于职务代理，犯罪后果应由中介公司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同时厘清职务代理与表见代理在法律适用上的先后顺序。该案对规范中介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典型意义。

2017年2月，李某通过某房地产经纪公司签约购买一处房产，并与该公司签订了《居间服务合同》。在后续交易过程中，负责此单业务的房地产经纪人钟某，在公司门店内以办理购房资金监管为名，伪造相关材料，指示李某通过POS机刷卡支付，骗取李某297.7万元房款，该款项后被钟某挥霍。

此后，钟某因犯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法院判决其退赔李某297.7万元。但因钟某暂无财产可供执行，该退赔判决未能实际执行到位。为弥补损失，李某将房地产经纪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公司赔偿其被骗取的购房款。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在付款过程中未严格核查账户信息，存在明显过错；同时，钟某出具的 materials 上加盖公章并非公司真实公章，其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考虑到房地产经纪公司在监管方面存在过错，一审法院酌情判决该公司承担李某损失的35%，即赔偿104万元。

李某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北京二中院经审理认为，钟某作为房地产经纪公司的经纪人，其以办理资金托管为由指示付款的行为，属于二手房交易中居间方的职权范围，符合职务行为的特征，本质上是职务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归属于房地产经纪公司。李某在付款时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存在疏忽，应自担部分责任。

据此，北京二中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房地产经纪公司对李某的损失承担90%的主要赔偿责任，应赔偿李某损失267.93万元。

“此类案件属于典型的民刑交叉问题，民事诉公与刑事诉公在法律关系、责任构成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二者不能相互替代。”负责审理该案的北京市二中院法官在庭后表示，刑事判决追究了房地产经纪人钟某的诈骗罪责，但并未解决被害人李某与房地产经纪公司之间的民事纠纷。购房人因房地产经纪人犯罪行为遭受损失，另行起诉要求经纪公司承担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进行审理。在民事案件处理中，需查明刑事退赔的执行情况，若刑事部分已有退赔，应在民事赔偿金额中予以扣除，以避免权利人双重受偿。

法官解释称，在认定经纪人诈骗行为的民事责任归属过程中，关键在于厘清其行为性质是职务代理还是表见代理。职务代理指代理人基于其职务职权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效果归于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表见代理则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有效。二者适用前提不同，职务代理本质是有权代理，而表见代理属于无权代理。

经纪人隶属于公司，在判断其行为责任时，应优先审查其行为是否属于职权范围内的职务行为。本案中，协助办理资金托管等事宜是二手房居间服务的常见内容，属于房地产经纪人的职权范围。钟某在公司的场所内，以履行居间职责的名义实施行为，相对人李某有理由相信其是在执行职务。因此，该行为应被认定为职务代理，其法律后果应由房地产经纪公司承担。

此外，在最终确定赔偿责任时，还应综合考量合同性质、双方地位及义务等因素。房地产经纪公司作为专业机构，对房地产经纪人、经营场所及交易流程负有严格的监督管理责任。钟某在门店多次实施诈骗行为，涉案房地产经纪公司却毫不知情，显然未尽到应有的监管义务，这是导致损失发生的主要原因，故应承担主要责任。

相较之下，购房人通过中介公司交易，本身即包含了对专业服务的信赖，旨在利用中介公司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确保后续交易安全顺利完成。在居间合同履行中，不能对购房人注意义务要求过于严苛。本案中，李某作为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普通购房人，信赖钟某房地产经纪公司经纪人的身份，按照其指示在房地产经纪公司门店内刷卡，虽未注意到POS机代理商名称及办理地点的区别，存在一定疏忽大意，但并未明显低于一般购房人应尽的注意义务，故李某相比于房地产经纪公司，承担次要责任为宜。据此，法院终审判决房地产经纪公司、购房人分别承担90%和10%的责任。

法官表示，对于中介机构员工在履职过程中实施的犯罪行为，中介机构因疏于监管未能防范的，应对受害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这将有助于督促中介机构加强内部管理，规范经营行为。

## 中介机构未尽到监管义务应担主责

房地产经纪人在设下骗局致购房人损失数百万 法院判定

## 惠州中院创新破解车辆『失联』执行僵局

□ 本报记者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焦国桐 苏乔

涉案车辆查封后下落不明，难以推进罚没财产处置兑现，又影响服刑人员申请减刑权利，如何精准破解这类“执行堵点”？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该院以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为引领，充分发挥执行联动机制效能，构建失联报废罚没车辆处置路径，成功破解下落不明车辆执行难题，为同类案件办理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2020年7月27日，惠州中院依法对被告人刘某兵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一案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法院依法扣划被执行人名下银行存款，同时查封其名下一辆机动车，但因该车长期下落不明，相关处置工作陷入停滞。2021年11月17日，在同案犯相关财产处置完毕后，该案依法终结执行。

2024年10月，东莞监狱向惠州中院发函，商请核实刘某兵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为其减刑工作开展前期准备。此前，刘某兵家属反映，多方查找未发现涉案车辆下落，且车辆已达到强制报废条件，为保障刘某兵依法申请减刑的权利，家属自愿代为缴纳车辆残值费用，恳请法院依法处置涉案车辆。

面对“车辆下落不明无法实际扣押，缺乏明确处置依据”的困境，惠州中院积极探索破解路径，并未简单以“执行不能”收场。法院经梳理发现，此类“查封未实际控制但已达到强制报废标准”的罚没车辆处置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亟须建立规范化、标准化的处置机制。

依托执行联动机制，惠州中院积极与公安机关、发改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开展协商，公安机关明确达到报废条件的车辆严禁上路行驶，一经发现将依法扣押并予以处罚；发改部门反馈报废车辆暂无统一市场指导价；商务主管部门详细提供了全市3家具备报废车辆回收资质的企业信息，并说明回收价格主要参照废铁市场价实行市场调节。

为推动类型化问题规范化解决，惠州中院召开全市两级法院执行业务交流会，深入研讨此类问题涉及的法律适用难点，形成一致意见，明确对“下落不明、符合强制报废条件、服刑人员及其家属愿意缴纳残值费用”的罚没车辆，可参照强制报废车辆处置流程办理。

在车辆残值核算过程中，法院向三家资质企业发函询价，最终以1867元/吨的平均价格作为计价依据，在核实涉案车辆车身重量后，最终核算残值为3313.93元。2025年1月9日，刘某兵家属足额缴纳该笔费用，款项全部上缴国库。1月17日，惠州中院向刘某兵发出《执行告知书》，明确车辆已处置完毕并邮寄寄至东莞监狱。

惠州中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院将持续深化执行工作规范化建设，不断健全完善执行联动机制，以更加强劲的执行举措，扎实推动“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落地见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